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 家长参与的现状与需求 ——以大庆市为例

孙红华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有效的家长参与是促进家庭教育的关键,而厘清当前家长参与的现状和需求,则为加快制度落实与完善具体举措提供重要参考。本文以大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了872份有效反馈,发现当前家长群体存在由教育焦虑引发的学历焦虑、过度强调学校职能、以及对教育指导“高需求”与“低成本”预期并存的问题。

关键词:家长参与;教育焦虑;家庭教育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7.148

一、问题的提出

(一) 家长参与概述

家长参与是相当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家长在具体教育或与教学相关环节的参与,例如课后作业检查与辅导、准备升学材料、与班主任交流孩子在校表现等;也包括对现行学校教学管理模式承担监督职能、议程设定乃至内容教学等全链路、深层次的“在场”。在后一种情况下,家长往往作为与学校及其教师同样重要且独立的主体产生影响,而不附属于学校。

从参与的性质来看,家长参与以控制和支持两种基本方式来介入孩子的习得过程。控制既是监督,强调以纪律和规则来约束孩子不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行为,进而为孩子建立与“恶”泾渭分明的规范性框架,划清行为下限。相对的,支持则是正向激励,侧重于为孩子的发展提供合适的物质条件或充盈的情绪价值,进而扫清阻碍孩子取得进步的障碍,最大限度发掘潜能,去追求抵近至“善”的一面。

依此逻辑,控制和支持分别作为纵坐标和横坐标的参数,家长参与可延伸划分为四种类型:不控制也不支持的回避型参与、控制但不支持的专断型参与、不控制但支持的宽容型参与、以及既控制也支持的权威型参与。这一框架有利于辨析家长参与的特点,对其过程和效果进行针对性评估。

(二) 家庭教育制度建设

此前,我国家庭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自从“双减政策”实行以来,家庭教育逐渐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家长是主导家庭教育过程的主体,在优质资源稀缺、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家长们往往伴有育儿焦虑与压力,由于教养知识与技能的缺乏,家长

们对遇到的育儿难题常常表现出束手无策。自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根据我国社会的转型加速,以及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转换,家庭教育中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愈加凸显。因此找到适切家长家庭教育的需求和应对策略,帮助家长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家长,变得十分迫切。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纲领性法律条例相继出台。在常态化机制建设方面,国务院、全国妇联和教育部等多部门颁布了一系列家庭教育的专项政策法规,推动家庭教育发展,如“九五”至“十三五”期间的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计划,《家长学校工作指导意见》《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政策意见。这些文件从法理和制度建设上为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发挥了规划、指导的作用。

另外,责任主体的范畴从中央转向了地方以及更广泛的非政府主体。《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应加强对家长的教育指导,构建学校和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会、镇村、家庭协同育人格局,推进共同育人,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体系的育人目标。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and 家校协同育人格局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基于以上政策法规,并结合现实治理中关于规避家长因“过度忽视”与“过度焦虑”引发的不良家庭状态的考虑,亟待推进开展家长教育,引导家长学习全面的科学教育知识,掌握系统的家庭教育理念方法,可以有效缓解其焦虑不安的情绪。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聆听家长的教育需求,为家长指点迷津,提

升家长教养能力，提高全民整体的素质，从而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助力。

（三）厘清家长参与现状的意义

当前我国教育竞争激烈，义务教育阶段尤甚。家长愈倾向于采取权威型参与类型，在孩子的教育上“精耕细作”。从积极方面看，高投入的家长参与对孩子学业水平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充分讨论。^[1]从消极方面看，家长过度向孩子施压会对其长期发展，尤其是本科期间的学习、提高综合素养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2]因此，梳理义务教育层次学龄家庭的现状，尤其是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和诉求，有利于揭示问题，防范不当教育的风险。同时有利于信息向有关部门传递，优化调整制度设计，建立更完善的家庭教育扶助、互助机制。

二、案例研究：大庆市家长参与的现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以《中学学生家长教育需求调查问卷》为工具，共收集到872份有效反馈。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家长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户籍、职业、家庭结构等。第二部分是家长教育现状量表，包括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遇到的教养知能、沟通与社交、心理调适方面的需求。第三部分是对家长们的信息补充与关于家长教育的其他建议和看法。

（二）研究对象及家庭概况

本研究以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家庭）为研究对象，其中初三年级的家长最多，占总体的37.2%；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家长占35.6%，而初中一到四年级的家长占64.4%。填写人为母亲的占比达到78.8，父亲的占比为21.2%。大部分家长拥有初中及以下的学历，占比46.4%，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家长占16.8%。

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子女就读学校位于大庆市区及县城的家庭占到了总数的79%，而位于农村地区的家庭占比21%。大部分家庭月收入水平为4000元及以下，占比为43.5%，月收入介于4000元至8000元之间的家庭数量与前者接近，占比达36.9%。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长占总体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0.2%；属于机关党群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生产运输操作人员的家长占比较少，分别为4.6%、7%、5.2%。

从家庭结构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为核心家庭，占比高达样本总体的68.6%。孩子与父母及祖辈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占比为16.6%，居于第二位；孩子与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生活的单亲家庭占比为7.34%；没有父

母陪伴，孩子只与祖辈一起生活的隔代家庭占比为4%；而孩子与亲生母亲或父亲中的一方，以及继父或继母中的一方共同生活的联合家庭占比为1.8%。

（三）家长参与的挑战与需求

1. 家长参与教育的现状

谈及教育孩子的实际情况，占比44.5%的家长认为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感受到困难，相比之下明确表示对孩子有信心家长仅占比14.2%。从教育参与的具体内容来看，如何通过家长的引导和支持来改善孩子的身心健康情况受到大多数家长关注，其中61.1%的家长对此表示担忧。另外，在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培养生活适应性能力和社会交往技巧、青春期性教育三个方面，表示自己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的家长占比都高于40%。对于家长来说，这三点相比于其他教育内容更具有挑战性。值得注意的是，“学历焦虑”现象在家长参与中比较普遍，有43%的家长认为自身有限的知识水平不足以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有效帮助，相比之下，仅有8.5%的家长完全不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顾虑。

2. 家庭教育指导的责任主体

在调查样本中，希望孩子所在学校作为指导机构的家长占比84.5%，远远高于专业指导机构的32.9%和社区的26%。具体到指导人员，高达68.4%的家长希望孩子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来承担这个任务，倾向于职业化的家庭教育专家的家长也占到了总体的52.4%，仅次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由此可见，家长中的大部分仍然对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角色高度信赖，对职业化、专业化的家庭教育途径的信任低于传统方式。

3. 家庭教育指导的参与形式

问卷分别调查了家长群体对集体家庭教育指导和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的组织模式的期待。在集体指导方面，家庭教育讲座、经验交流会或座谈会以及亲子活动三种形式更受到家长的青睐，偏好此三类的家长占比分别为52.41%、44.3%、43.8%。同时，倾向网络平台的集体指导活动的家长占比最低，仅为14.1%。在个别指导方面，倾向于一对一现场咨询、家访两种形式的家长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分别占总体的51.8%、41.3%。希望以QQ、微信等互联网社交媒体参与的家长仍能达到总体的22%，但相比之下，仅有7.7%的家长表示愿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沟通。另外，支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收费的家长占比26.5%，而反对收费的家长占比73.5%，大约四分之三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指导应具有公益性质，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之内的社会福利。

4. 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需求

从需求来看,家长群体最为关切的领域为“如何帮助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如何引导学生感恩父母、诚实为人、诚信做事”,以及“如何培养学生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存在这三方面需求的家长都超过了总数的60%,其中认为自己在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方面“非常需要”家庭教育指导的家长高达38.8%,是所有持“非常需要”态度家长中在同一需求领域里占比最高的。

三、分析与讨论

(一) 由教育焦虑引发的学历焦虑

基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大庆市的家长群体对于亲身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存在普遍的不自信现象。一方面,结合对受访对象的家庭概况的统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的信心更充分,尤其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占比16.8%,比较接近14.2%的明确表示对教育孩子有信心的比例。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家长的学历水平与其是否具有适当的、充分的教育孩子的知识能力并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3]学历为本科以下的家长占比为83.1%,同时有43%的家长认为自身有限的知识水平不足以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有效帮助。这组数据说明存在一部分家长虽然绝对学历水平并不突出,但却通过自学、观察等方法后期习得了家庭教育的知识,掌握了高于与其原本学历水平相符合的教育技巧。

与此逻辑相似,占比8.5%的家长认为自己知识水平足够指导孩子,其数量仅为占总体16.8%的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家长的一半。这组数据说明,即便家长绝对学历水平大幅高于平均值,也有可能并不熟悉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缺少相关实践经验,甚至将自己在专长领域积累的知识、经验不加辨析地挪用在孩子身上,引发反效果。因此,无论本身学历高低,家长都会产生教育孩子的焦虑感;而正因为缺少专业家庭教育知识的理论支撑,陷入教育焦虑的家长又习惯于将眼下的困境错误归因,归咎于自身知识水平(尤其是学历)的不足,进而引发了学历焦虑。

(二) 过度强调学校职能

面临着教育焦虑,大部分家长都选择更紧密地跟随学校的步调,尤其是寄希望于孩子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给出针对性的辅导意见。这一方面与家长把家庭教育重心放在提高孩子学业成绩和学习热情的根本动机有关;另一方面,也突显家长习惯按照自身成长经历而进行路径依赖,忽视了近年迅速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家庭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事实上,学校及老师已经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与事务性工作,很难有效为每一个孩子提出切实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意见。

(三) 高需求与低成本之间的矛盾

无论以集体还是个别的形式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家长群体都倾向于线下而非线上参与。而具体到个别指导来说,“一对一访谈”和“家访”这类深度交流、能依据孩子个性及家庭背景而给出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模式,更是得到家长的广泛认可。然而,此类服务首先就与“希望学校及班主任老师作为指导主体”的诉求相矛盾,悬殊的师生比根本无法确保每个孩子的家庭被分配充足的指导时间。

此外,家长内部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是否收费的分歧较大,而对于四分之一愿意付费接受服务的家长来说,每个家庭的价格预期也存在差异。因此,即便引入学校以外的职业化、市场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也很难协调出可接受的、统一辅导价格。完全放开价格监督又有可能激化家长的教育焦虑,尤其是中产阶层家长间的恶性内卷,这与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

结语

通过对大庆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家长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包括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和对自身的学历焦虑,过度依赖学校机构,以及产生多样化、高标准的家庭教育指导需求的同时缺乏支出相应成本的意愿或能力。可以说,《家庭教育法》为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面对复杂化的家庭教育挑战,需要建立包含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扩大家庭教育先进理念、方法的传播,鼓励家长发挥更积极的“主人公”作用,能动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

参考文献

[1] Boonk, L., Gijsselaers, H. J. M., Ritzen, H., & Brand-Gruwel, S.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dicator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18, 24: 10-30.

[2] 黎娟娟,黎文华.Z世代大学生多重矛盾性社会心态解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2(07):104-110+30

[3] 周序.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7(06):96-106.

作者简介:孙红华(1973-),女,医学学士,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科部讲师,大庆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国学、儒家理论,汉族,黑龙江大庆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大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庆市中小学生家长家庭教育指导需求现状及对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SGB2023119